

民國十三年

遼瀋書社

五月一日星期四

夏曆甲子三月二十六日

孟子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

為君子三樂之一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中庸云相在尔室而不

愧北屋漏日詩亦是此意君子惟內不慙於衣影上不愧北屋

漏始能為之落獨往獨來盡樂莫樂於此矣余居貧守

約安閑其害家錢物濟之去義應受者勉費不安或
靜晤室日記

諸心以為安乎則受之以為無媿無怍乎則受之以不慙於食

影不愧於屋漏乎則受之夫事既安於非義則何能心安



遼陽金毓黻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

靜晤室 目記

第一卷
第一冊

遼瀋書社

靜晤室日記
Jingwushi Riji
(全十冊)
金毓黻 著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 校點

遼瀋書社出版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32 字數：5,550,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責任編輯：王 申 劉中平
封面設計：蓋玉春 責任校對：李守勤等

ISBN 7—80507—097—0/K·22

登記號：(遼)第14號 定價：(平)400.00元(精)500.00元

《金毓黻文集》

編輯整理委員會

金毓黻學術研究

基金管理委員會

顧問：金景芳 鄒有恒

葉幼泉

主任：金長振 李玉蘭

副主任：徐毅鵬

主編：佟冬

委員：（按姓氏筆劃爲序）

副主編：劉英傑 孫玉良

呂彬 李玉蘭

趙鳴岐 宋焮

李治亭 宋焮

編委：叢佩遠 崔國璽

金家玲 周光培

范壽琨 佟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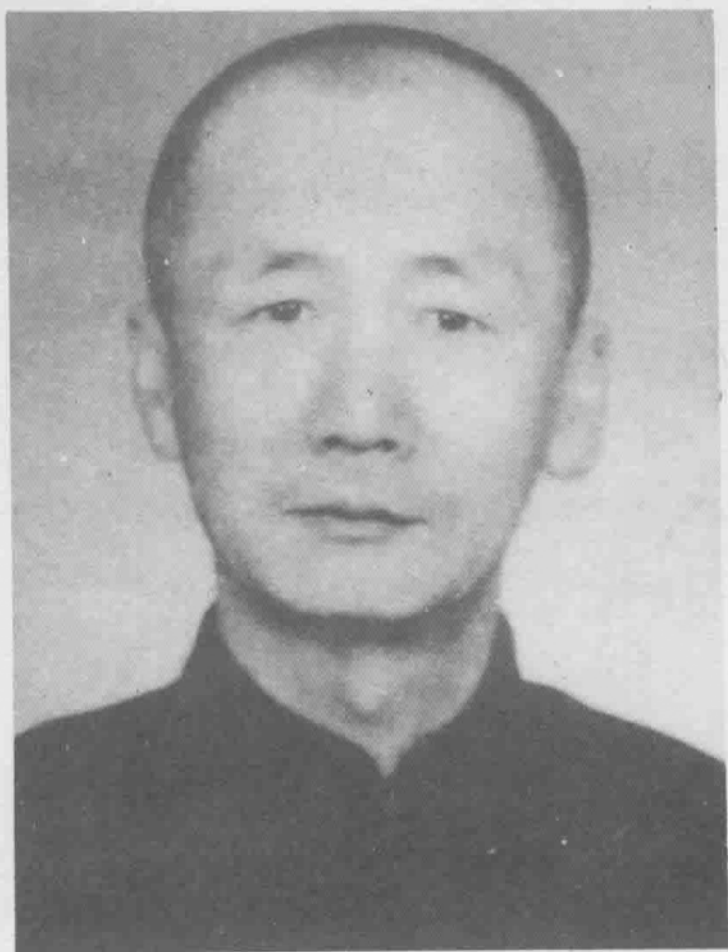
袁閭琨 孫玉良

陶統秀 孟東暉

徐毅鵬 鄒明珠

張復 張有義

趙鳴岐 劉英傑



金毓黻先生



金毓黻先生的少年時代



金毓黻先生在居室前



金毓黻先生考察開城善竹橋泣碑亭



金毓黻先生及夫人與親屬合影



金毓黻先生與同人合影



金毓黻先生及夫人同家人合影 (一九五一年十月)



陳垣先生在
金毓黻先生追悼會上



金毓黻先生之墓

墓前為金先生四子金長振先生(右)及其夫人李玉蘭女士(中)



金長振先生(左二)與夫人李玉蘭(左一)及金先生之婿鄒友恒先生(右一)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佟冬在一起。



金毓黻先生《靜晤室日記》原稿

前言

金毓黻是本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學識淵博，工力深厚，於歷史、文學、文字學、考古、文獻、歷史地理諸門都有研究，尤其以東北地方史之研究具有較高的造詣，著述宏富，逾越前人，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時人吳廷燮評曰：「中夏言東北故實者莫之或先」。他是中國近代以來東北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者。

一

金毓黻，原名毓璽，一名玉甫，字謹庵，又字靜庵，別號千華山民，書室號靜晤。遼寧省遼陽城北後八家子村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公元一八八七年七月十九日），歿於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終年七十六歲。

金毓黻生活於中國社會的動盪與轉變時期。他一生中雖然從過政，在民國地方政府中做過僚屬，但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經歷大致可分為求學、仕宦和教學著述三個時期。

一、求學時期（一八九二——一九一六年）。金毓黻的父親金德元是一位鄉間塾師，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耳濡目染，金毓黻從小就喜歡讀書。他六歲入本鄉私塾。十六歲時因家計所累，輟

學習商，然「一日未嘗廢書」，尤其喜歡宋明理學。一九〇六年重新就讀於遼陽縣啓化高等小學堂，一九〇八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學堂，一九一二年冬中學畢業，伴讀於城北小煙臺楊雨樵家。一九一三年秋考入北京大學堂文學門，一九一六年夏畢業。在求學期間，有兩人對他的影響比較大，對其後來成爲一代史學大家起了重要作用。一位是縣立啓化高等小學堂校長白永貞，字佩珩，遼陽地方名儒，後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任奉天通志館館長，負責籌劃纂修《奉天通志》。白永貞對鄉里俊秀、穎悟好學的金毓黻十分賞識，對其窘於家境無力讀書頗爲同情。出於對晚學之獎掖，白永貞特許金毓黻免費進入縣立啓化高等小學堂讀書。金毓黻在《日記》中寫道：「余少受知於佩珩先生，承其獎飾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來，得時時溫理故書，日與古人晤對，而不致爲君子所棄者，師之賜也，如何可忘！」（見金毓黻《靜晤室日記》。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處者均同此。）另一位是音韻、訓詁學家、文學家黃侃（字季剛）。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黃侃應聘於北京大學，金毓黻直接受業於黃氏門下，頗得黃氏治學之法，受益匪淺。正如他後來做詩追述道：「廿七登上庠，人海紛相逐。廿八逢大師，蘄春來黃叔。授我治學法，蒼籀許鄭優。研史應先三，窮經勿遺六。文章重晉宋，清剛寄緇鬱。」可見黃侃對其影響至深。

二、仕宦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三六年）。一九一六年北京大學畢業後，金毓黻返回東北，任教於瀋陽文學專門學校，兼任奉天省議會秘書，後升任議會秘書長。從此來往於瀋陽、齊齊哈爾、吉林、長春之間，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一九二〇年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科長，一九二一年任吉

林省永衡官銀錢號總文書，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長兼秘書，吉長道尹公署總務科長，一九二三年任吉林省財政廳總務科長，一九二五年任長春電燈廠廠長，一九二九年任東北政務委員會機要處主任秘書，一九三〇年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一九三一年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此時，金毓黻已成爲負責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職位不謂不顯。然而，爲政並非金毓黻本志。他自述這段經歷時說：「余本書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與政治關係甚淺，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國數千年之慣，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問政治無明確之界畫，故學問之士非投身政界無以謀生。實以此爲謀生之具，非以其有興味而爲之也。」在此期間，他利用從政的便利條件，四處考察，廣爲搜求，組織「東北學社」，創辦《東北叢書》，公餘之暇，博稽古書典籍，整理研究東北歷史文獻資料，並有所著述。

「九、一八」事變，金毓黻不幸被日寇逮捕，拘押三個多月。獲釋後多次拒絕就任偽職，堅持愛國正氣。日人無奈，硬派爲偽奉天省府參議、省公署參事。一九三二年夏，經偽省長臧式毅出面斡旋，出任偽省圖書館副館長。於是，金毓黻一面整理圖書，虛與敷衍，一面籌思脫出之計。後徵得《奉天通志》總纂之職，行動方稍得自由。一九三六年，以考察文物爲名，假途日本東京，轉往上海。幾經周折，歷盡艱險，終於擺脫了日寇的羈絆。陷敵四年，金毓黻「百無聊賴」，「博稽古書，參以目驗，歲月不居」，潛心致力於東北鄉邦興地故實之學和編輯整理東北文獻古籍。

三、教學著述時期（一九三六——一九六二年）。一九三六年秋，金毓黻由上海轉赴南京，經蔡

元培、傅斯年介紹，受聘爲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同時兼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參議。一九三七年五月，離校前往安慶，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同年年底，安徽省政府改組，金毓黻遂溯江而上，轉赴重慶。這時候，由於南京、上海等地相繼淪陷，中央大學遷至重慶，一九三八年春，金毓黻回中央大學擔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一九四一年秋，轉至四川三台東北大學任教，兼任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後改爲文科研究所）主任。一九四四年四月，又回中央大學任教，擔任文學院院長。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日戰爭勝利，九月，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仍在中央大學任教。翠年夏，重返東北，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輔導委員和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東北區代表的身份，視察東北文物。一九四七年二月，辭去監察委員和中央大學教授職務，改任國史館纂修。同年四月，任瀋陽博物館籌備委員會主任，負責籌建瀋陽故宮博物院事宜。同年秋，前往北平，任國史館北平辦事處主任。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舊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金毓黻轉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同時在輔仁大學兼課。一九五二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直到一九六二年逝世。

這一時期，金毓黻結合教學需要，在前一時期搜集、整理、研究資料的基礎上，集中精力轉入研究與著述，是其史學研究的繁榮發展時期。其中，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爲其史學研究的鼎盛階段，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爲其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階段，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二年爲其

史學研究的繼續鞏固階段。金毓黻一生中最重要的幾部著作大都完成於這一時期。

二

金毓黻學有淵源，功底堅實。一九四四年，他在四川三台東北大學近代史研究學社講學時說道：「余之治學途徑，大約謂始於理學，繼以文學，又繼以小學，又繼以史學。」這是成名後的金毓黻對其前三十年治學道路的總結。接着又道：「吾國學術應不出理、文、小、史四學。」以理學、文學、小學為根基，再去治史，便會「有文濟其美之效」。顯而易見，金毓黻為學所遵循的是中國傳統的史學家所走的道路。下面根據他自己的敘述按照時間順序談談他的治學過程。

「九·一八」事變後，金毓黻在其自撰《千華山館書目序》中說：「大抵自壬寅（一九〇二年）訖丁未（一九〇七年），喜購宋明理學之書，開始治理學。這時候正是金毓黻輟學習商期間。輟學並不廢學，他以私塾教育為基礎，有意識地選擇理學書籍，誦覽鈔錄。他在日記中說：「憶年十六、七時，在書肆購得《三魚堂集》，繹誦數過；以謂近代醇儒，莫清獻若。」對清代理學家陸隴其推崇備至，後曾言「余志學之初，由先生入，於此不敢持異同之見。」遂因其為起端，「以求濂洛關閩之書。復得《正誼堂全書》，宋賢嘉言，燦然具在。而其中有清獻著作四種，尤所葆貴。因是更求所著之《四書大全訂本》、《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日記》及《贖言》，皆已得之。」金毓黻不僅將行世的諸如此等宋以來理學家著作，「繹誦數過」，而且自謂「漬於義理者甚深」，「故於任事事人，皆守皎然

不欺，蒙難而貞之義」，作為立身行事之所本。他認為宋之朱熹、清之顧炎武文章之工，後世殊無倫比，「由其學問優也」。因而，「文學之士，首貴有本。本源既裕，文自能工」。因此，金毓黻假得《通鑑綱目》，反覆誦讀，且手鈔續編數卷。《通鑑綱目》是朱熹把「理」從哲學領域引入史學領域，以「理」為最高標準或原則，來規定史學的對象範圍、史事的取舍和史著的評價的一部書。其核心思想是明正統，斥篡賊，立綱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這些史學理論對後來金毓黻史學觀點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比如金毓黻主張以「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為「國家社會之中心」。提出「史以紀事，而事中必有理在」。他的所謂「理」，指的就是朱熹之所謂「理」。這當然是封建史學家傳統的史學觀點。他却將這一「前賢之成說」，無批判地繼承了過來。當然，金毓黻的史學觀點，不止受宋明理學的影響，另外還受了資產階級史學思想的影響。象堅持梁啟超的所謂「歷史進化」的見解，對歷史現象作為一個過程來加以考察的思想等等。新中國成立後，金毓黻的史學思想發生了一定變化，自願學習馬克思主義，初步了解了歷史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改變了對工農群眾的觀念。他說：「大抵今日作史應具正反兩面，就工農大眾及有功於人民之史實盡量記載，以明其為國史之主人翁，此為作史之正面；又就統治階級及其他遠於人民之史實盡量記載闡發，以明其為國人所共棄，此為作史之反面」。可見這時候金毓黻的史學思想已經有了很大進步，這是值得肯定的。

金毓黻在自撰《千華山館書目序》中又說：「自戊申（一九〇八年）訖壬子（一九一二年），則喜購

古文家專集。』這即是說，在他二十二歲至二十六歲時，亦即相當於中學讀書時代，則有志於文學。金毓黻爲文簡潔生動，富於文采。他曾自許道：「撰述史學文章的文字有三要：一曰雅而能健；二曰舉重若輕；三曰無格格不吐之病。」他在寫作上有此等修養，實初始於中學時期。那時他就很喜歡古文家的作品，常常購而讀之。並因此而報考北京大學堂文學門，進行深造。其自述「余早治文學，雅喜桐城」，大約就是說此時之情形。後又嗜《文選》，喜讀《後漢書》，崇尚晉宋之文。至於「詩歌韻語，亦喜爲之。佳日美景，有觸而發，務令情韻不匱」。古體詩取法大、小謝，近體詩學李商隱、杜牧，尤喜蘇軾和元好問，晚歲輯有《千華詩稿》。總之，他一生十分重視文學，主張研究史學，必須以文學輔之。認爲「紀事明理必以文表而出之」。「文以載事爲職，事必資文以傳，二者相需甚殷，不可偏廢」，「文能優美，乃稱佳史」。並舉例道：「史文翔實高簡，非大手筆不能爲。宋元諸史，穢荒冗雜，識者病焉，此即文章不工之咎」。

金毓黻在《千華山館書目序》中又道：「自癸丑（一九一三年）訖壬戌（一九二二年），又喜求經訓小學之書」。即他在二十七歲至三十六歲時，相當於大學期間和回東北的頭五、六年，則注重研究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金毓黻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親承黃侃指授，同時受到了樸學大師章太炎的影響。金毓黻自稱「余往歲篤守餘杭章氏學派家法，顛治箋疏之學」。章太炎倡導古文經學，認爲要將「經當歷史看」，主張「實事求是」，應「以治史的法子來治經」。（章太炎《說新文化與舊文化》。見《太炎學說》，四川辛酉春觀渡廬印本。）金毓黻贊同并接受了章氏的這一思想。一九二〇年他在《日

記《中總結這一時期的治學心得曰：「與其讀宋儒經注，不如讀清儒經注，與其讀清儒經注，不如讀漢唐諸儒注疏，與其讀注疏，不如讀《十三經》白文。蓋以注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以漢唐宋清人之見解經，不若以周禮之見解經。《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解經讀史之法亦惟易簡而已矣。」當然，這種「以經解經」、「解經讀史」的見解不獨源於章氏，更早應源於清代經、史學諸大家。與此同時，金毓黻還從章氏那里汲取了古文經學派的治學方法。章太炎早年於詁經精舍曾跟隨俞樾埋頭「稽古之學」，精於文字音韻。嘗謂：「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於傳記者已寡，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蹟，此與地中僵石爲無形之二種大史」。（章太炎《致吳君遂書》。見《政論集》第一七二頁。）特將語言文字與地下考古文物視爲歷史學的兩大資料來源。對「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蹟」，每能「尋審語根」。金毓黻對此十分信服，倍加稱許。評論說，章氏平生所致力者以「辨書籍真偽，通小學，明地理」三事爲最精。並因以推崇章氏之文：「不讀則已，讀之則豁然理解，快意肆志，陳義似高，味之彌永。如撫古鼎彝，雖不必周於世用，而古色蒼勁，莫測其際。求之并世，諸子臻此境者，實無第二手也。」章氏謂「治史盡於有證」，「持論多求根據，不欲以空言義理以誣後人」，金毓黻則發揮說，文字學是「讀古籍之門徑，不得其門則無以曉其理、知其事」。所以，同治文學一樣，治小學也是治史的一個重要工具。惟其如此，金毓黻十分重視對小學這門學問的研究與總結，曾先後撰寫《說文叙小箋》、《說文綱要》、《說文疑文舉例》、《音韻略論》和《廣韻釋例》諸文。